

# 论白居易儒家思想的矛盾及其成因

杜学霞

(郑州师范学院 中原文化研究所,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白居易的儒家思想存在着矛盾,其矛盾主要表现为“兼济”与“独善”的矛盾,民本仁政的仕进思想与冷漠的退隐思想矛盾,“志于道”与迷茫“中庸”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与中唐文化转型有内在联系,它们既反映了中唐儒学转型时期白居易本人对儒家思想理解的局限性,也反映了中唐世俗文化的勃兴对白居易人生观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矛盾;文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I20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4-0142-03

**作者简介:**杜学霞(1965—),女,河南原阳人,郑州师范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化学和唐宋诗学研究。

## 一、“兼济”和“独善”的矛盾

白居易的儒家思想首先表现在“兼济”和“独善”的矛盾。“兼济”与“独善”思想是孟子提出来的:“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sup>[1]304</sup>白居易自己也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sup>[2]2794</sup>他贞元十九年入仕后到大约元和十年以前,一直以自己的行为实践着这一理想。宪宗元和元年,他为应制举写成七十五篇《策林》,是他早期政治思想的体现。他认为造成中唐国事衰微、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是藩镇割据和政府赋税过重,并提出“戒厚敛及杂税”<sup>[2]3473</sup>、“节财之困穷由君之奢欲”<sup>[2]3475</sup>等政治主张。元和二年到元和六年,他任左拾遗和翰林学士期间,多次向皇帝进言对当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如对削藩问题、宦官专权问题等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还将自己的政治主张践行到诗歌创作中来,写了大量“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讽喻诗(包括组诗《秦中吟》和组诗《新乐府》等)。这些诗歌题材广泛,锋芒毕露,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

色”,使“执柄者扼腕”,使“握军要者切齿”<sup>[2]2792</sup>。也正因为直言敢谏,他遭到了权贵者、执柄者、握军要者的嫉恨。元和十年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在贬谪生活中,他对政治的险恶有了一定的认识,思想上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渐有了与黑暗势力抗衡的无力感和挫败感。他不再完全按照儒家的“兼济”思想要求自己,而是向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等思想靠拢。

但是,白居易的“穷则独善其身”与儒家的思想是有所不同的。“兼济”和“独善”是孟子提出的处世态度。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思想反映了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白居易与之无多大差别。“穷则独善其身”本是儒家对于人面对挫折和困境时提出的对策,是外界大环境不允许“兼济”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在正统的儒家看来,“独善”时是要遵守儒家的“道”的,其最终目的还在于“兼济”,因为孟子的“兼济”和“独善”有个前提:“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sup>[1]304</sup>由此看,儒家的兼济和独善是不矛盾的。而白居易认为:“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

收稿日期:2014-03-11

• 142 •

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sup>[2]2794</sup>这显然是将“独善”和“兼济”对立起来看待了。

## 二、民本仁政的“仕进”思想与冷漠的“退隐”之间的矛盾

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其思想源头来自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sup>[1]328</sup>。从踏上仕途到元和十年前，白居易不仅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更是在诗歌中表达了他仁政爱民的思想。他在任左拾遗和翰林学士期间，不仅向皇帝进言，要求减免旱灾地区的赋税，在诗歌中，也表达了自己的民本仁政思想。他的讽喻诗中有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如他的名篇《杜陵叟》就体现了他关心民瘼仁政爱民的民本思想。此诗写于元和四年，是年京畿大旱，朝廷虽然颁布了免税的法令，但由于贪官污吏没有按照朝廷的命令具体执行，人民并未受到实惠：“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尺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sup>[2]223</sup>白居易的诗不仅对老百姓疾苦的深表同情，还能揭示造成百姓穷困潦倒的深层原因。如他在《卖炭翁》中指出造成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原因是“黄衣使者白衫儿”，在《轻肥》中指出造成“衢州人食人”现象的原因是宦官当政。在《买花》中以“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来说明封建贵族的奢华生活是建立在对广大人民剥削的基础之上的。即便元和十年以后，他仍尽力为老百姓谋福利。如在任杭州刺史时，他发动杭州百姓，兴修了西湖钱塘湖堤，使杭州解除了旱涝威胁。为解决百姓吃水难问题，他带领百姓疏浚城中六井。宝历元年，他任苏州刺史期间，他尽其所能为苏州百姓解决一些民生难题。所以在他第二年因眼疾离开苏州时便有诗云：“闻有白太守，抛官归旧溪。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sup>[3]</sup>

可是，就在白居易积极实践儒家的仁政思想的同时，他的诗歌却时而流露出悲观厌世的退隐思想。如他任翰林学士时，就有“人生无几何，如寄天地间。何时解尘网，此地来掩关”<sup>[2]298</sup>的感叹。大和三年（公元829年），他退居洛阳，他的人生态度越来越趋向消极，看待外部的世界越来越冷漠，终于选择了“中隐”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中隐，是相对于“大隐”和“小隐”而言的“亦官亦隐”。“‘中隐’之‘中’，既有儒家的中庸思想成分，也有道家尤其是庄子的齐物论思想，还包括了禅宗不执著于一端的思考方式。中隐是多种思想的复合体。”<sup>[4]</sup>从白居易的自我表白看，他所谓的“中隐”的退隐方式，与儒家先贤孔

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sup>[5]87</sup>的思想是明显不同的。虽然孔子也把“天下无道”作为“退隐”的条件，但至于如何隐，孔子是讲原则、有底线的，其原则与底线就在于保持自己的人格和操守。相比之下，白居易的“中隐”完全放弃了儒家积极入世、安邦定国的理想，还在隐退后流露出过分追求享乐和价值虚无的人生态度。

## 三、志于道与迷茫中庸的矛盾

“志于道”语出《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sup>[5]33</sup>“中庸”出自《礼记·中庸》：“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sup>[6]691</sup>“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sup>[6]692</sup>“中庸”即中道，是儒家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也是儒家的一种处世态度。“志于道”反映了儒家对理想的执着，即使在穷困中也不改其道。白居易也曾有“志于道”的决心：“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始终之则为诗。”<sup>[2]2794</sup>从白居易前期经历看，他也确实曾经将“志于道”奉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他在元和十年以前所施行的拯时安民的善政充分显示儒家主张的“士志于道”的人生理想坚持和价值追求，《新制布裘》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温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sup>[2]65</sup>这与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疾呼何其相似。但他对于儒家的“道”是否“奉而始终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挫折和困难时依然能够坚持自己的理想，才是真的执着于“道”。白居易则由于个人境遇的不顺利不时地流露出对儒家思想怀疑态度：“不动者厚地，不息者高天，无穷者日月，长在者山川。松柏与龟鹤，其寿皆千年。嗟嗟群物中，而人独不然。早出向朝市，暮已归下泉。形质几寿命，危脆若浮烟。尧舜与周孔，古来称圣贤。借问今何在？一去亦不还。”<sup>[2]303</sup>这首诗对儒家思想充满了怀疑，在这里，被儒家视为圣人的尧舜周孔在他眼里也不过是一个平凡的生命。在这样的见解下，又何以坚持儒家的理想呢？正是这样的认识，导致他有时对待人生挫折的矛盾心态。白居易也谈中庸，但他的中庸思想与儒家的思想也有所不同。儒家的中庸思想主要是要求人采取“中道”，保持不偏激不过分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但我们从白居易的中庸思想中，看到更多的却是一些混迹世俗的平庸生活习气，中庸思想甚至成为他

为自己谋私利的一种借口。

#### 四、儒家思想矛盾产生的原因

“兼济”、“仁政爱民”、“志于道”之间是有着内在的联系。“兼济”反映了儒家的处世态度，仁政爱民思想反映了儒家仕进的目的，“志于道”反映了儒家思想在遇到问题时对自己理想的执着。以上三者都反映了儒家的积极入世态度，而独善、退隐、中庸则均反映了儒家在理想遇到阻力时的一种权变。就个人境遇而言，任何人都不能永远一帆风顺，总会遇到挫折，但儒家的独善也好，退隐也好，中庸也好，都是在挫折和困境面前一种权变，都有一定原则和底线的。但是我们在白居易身上，却看不到这种底线。独善、退隐、中庸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他追求个人享乐、追求个人私欲的借口。

笔者认为，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导致了白居易对待儒家思想的矛盾态度。

中唐社会是一个文化转型的社会，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等都发生着深刻的转型。其中，儒学转型和中唐市井文化的勃兴是两个重要方面。这两个方面，都对白居易的人生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致而言，中唐儒学转型是沿着如下几个方面进行的：首先是由章句之学到义理之学。中唐以前，唐代儒学重知识学问（章句之学），到了中唐，儒家思想的学者更注重把儒学当成一种用来指导自人生实践的思想体系（义理）；其次，中唐儒学转型表现在由强调儒家思想中的礼乐之学到重视仁义之学的转变；再次，在人格修养上，表现为由重视外王之学到兼重视内圣之学的转变；最后，在对待天人关系上，表现为由相信天人感应到相信天人交相胜或者直接肯定人力作用的转变。从以上几个转变观照白居易的思想，我们很容易发现，白居易的儒家思想冲破了章句之学的局限，他注意发挥儒家思想义理的作用。在礼乐之学向仁义之学的转变中，白居易明显继承了儒家的仁义思想。但是，白居易在人格修养上，还

参考文献：

- [1]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2]朱金城. 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3]刘禹锡. 刘禹锡集[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0: 421.
- [4]杜学霞. 朝隐 吏隐 中隐——白居易归隐心路历程[J]. 河南社会科学, 2007(1).
- [5]金良年. 论语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6]杨天宇. 礼记译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 [7]诸斌杰. 白居易的人生观[J]. 文学遗产, 1995(1).
- [8]谢思炜. 白居易集综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232.

明显停留在外王之学的阶段，而对“内圣”的关注却很少。我们知道，“外王”之学主要强调经世致用，白居易是儒家经世学的积极提倡者，在他为官的言论及实践上也是认真践行其经世学的，但对于儒家“内圣”学说，他却很少涉及。他的性命之学主要是从佛道思想中汲取理论依据的。在天人关系上，白居易也仅停留在汉代天人感应的阶段。认为天有自己的意志。在这种意志下，人力是不起作用的。由于对儒家内圣之学理解不够深入，白居易不能够将儒家思想贯彻到实践和行动中。遇到问题时，不是积极寻求解决的途径，而是将自己的失意与失败归结为天命并由此放弃改变现实的努力。

白居易不能坚持儒家理想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是因为中唐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的繁荣。白居易早年入仕时，就曾沉湎于歌舞声色，人生后期，更是热衷于美食声色等感官享乐。他退居到洛阳时，光是歌妓就带了十个以上。到洛阳后，都六十多岁了，还曾“三嫌老丑换娥眉”。

总之，白居易的儒家思想是复杂的。他前期也深受儒家经世思想的影响，儒家“兼济”天下、仁政爱民和“志于道”的思想对他都有深刻的影响。但由于处于唐王朝从中兴走向衰落的历史阶段，由于个人境遇的不顺利和个性脆弱等方面原因，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也并没有把他信奉的儒家思想坚持到底。白居易儒家思想局限性的关键在于他对儒家思想缺少践行的功夫。作为一个诗人和文学理论家，他在历史上的最大功绩就是把儒家思想贯穿于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中，“将经世精神引入了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术的诗文写作，鼓吹‘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样，曾为经世之学所不屑的文学，在‘理道’中开始有了新的价值。”<sup>[8]</sup>他这方面的贡献，是任何研究白居易思想的学者都回避不了的，也是任何治文学史的人都否认不了的。